



20世纪80年代 文学接受史研究

以

《平凡的世界》

《古船》

和

《红高粱家族》

为例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万水妍
／
著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接受史研究

——以《平凡的世界》《古船》和《红高粱家族》为例

万水 包妍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接受史研究:以《平凡的世界》
《古船》和《红高粱家族》为例/万水,包妍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 10

ISBN 978-7-5607-6212-8

I. ①2… II. ①万…②包… III. ①小说研究—接受学—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8512 号

责任编辑:王立强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发行部 0531-88363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4.875 印张 10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历史化”视角下的《平凡的世界》接受史	(11)
第一节 “历史化”学术思潮与《平凡的世界》 接受概况	(12)
第二节 《平凡的世界》文本形象的“历史化”	(31)
第三节 《平凡的世界》“历史化”图景的历史 评价	(39)
第二章 文学历史叙事批评与当代文化建设关系 视角下的《古船》接受史	(46)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与 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古船》接受史	(47)
第二节 人道主义、民间文化与新世纪《古船》 接受史	(65)

第三章 社会文化心理变迁视角下的《红高粱家族》	
接受史	(76)
第一节 “酒神精神”:从现代性启蒙到后现代	
解构	(77)
第二节 “历史叙事”:启蒙历史主义作为武器	
抑或反思对象	(86)
第三节 “民间”:从传统文化的注脚到知识分子	
人文精神的闪耀	(98)
第四节 《红高粱》影视剧的传播与接受	(112)
结 语	(128)
参考文献	(135)

绪 论

一、研究的对象与目的

本书以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古船》以及《红高粱家族》的接受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总结归纳它们的接受史上的关键词,研究这些关键词内涵演变的历史;探究它们的接受史上出现的重要观点的来龙去脉;研究它们的接受史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建设、社会文化心理变迁之间的关系。《平凡的世界》《古船》与《红高粱家族》可以代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它们不仅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而且在 21 世纪以来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可以说,它们在读者中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文学、文化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文化变革的源头。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接受史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在社会文化变动的大背景下,考察 20 世

纪80年代文学接受史;以20世纪80年代文学接受史为中心,考察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20世纪80年代文学接受史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建设、社会文化心理变迁之间的互鉴关系。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充实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研究。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写作多围绕作家的生平与创作、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展开,缺乏对文学接受史的重视。特别是关于文学接受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的研究可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

第二,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借鉴。文学接受既受社会文化建设、社会精神生活、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又对社会文化与精神起建构作用。20世纪80年代既是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转折时期,也是新的文化精神的形成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对这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能够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研究的背景与现状

本书研究的背景是近年来文学生活史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兴起。

2009年,温儒敏提出“文学生活”概念。《“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2012)和《“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



(2013)两篇文章阐述了其理论内涵和研究价值。前文指出“文学生活”所关注的是“事实”“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精神结构”“接受行为”^①；后文指出“文学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②。2012年第8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集中刊发了《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等7篇调查报告，是其理论应用的体现。对“文学生活”的研究已经成为新的学科研究生长点。

2015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山东大学召开的“文学生活与学术新视野”学术会议，是学术界对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文学生活”研究的一次集中探讨。会上，温儒敏强调“文学生活研究”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是“文学社会学”。这种研究所关心的并不是个别人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读者的“自然反应”。既然是社会对文学的“自然反应”，当然也就要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关注那些“匿名集体”（既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某些文学的生产、传播者）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胡亚敏认为，文学生活研究开阔了文学研究总体化上的视野，是“在社会网络当中全方位观照文学”，并在内涵上扩展了文学的边界。她还认为，“文学生活”概念建立在切实的本土生活基础上，与当前中国

① 温儒敏：《“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② 温儒敏：《“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现实的文学环境变化高度一致,具有可持续的生长能力,是富有开拓性的思想和学术创新。何锡章认为,文学生活研究具有方法学的意义,改变和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有格局,在研究对象、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上,使其从封闭走向开放。张福贵从多个角度系统全面地概括了文学生活研究的意义。首先,他认为这一研究蕴含着平民化、日常性的研究立场,是文学对普通百姓和日常生活的回归,体现了现代的人文精神,对传统文学观念有实质性的改变;其次,他认为这一研究让文学研究回到原生态,回到文学现场,突出了文学生产过程中的真实性和接受过程中的体验性,使文学研究渗透了真切的生命精神,是文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再次,他认为这一研究能够提升文学的文化品位,防止文学走向庸俗化、市场化,保持文学对社会的精神影响力,并引领和改造社会文化。李杨认为,在当下中国,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不再像以往一样承担民族国家建构的责任,而是更多地被娱乐化和商业化。文学研究方法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文学生活研究正切合了时代的特质,是与现实文学生态完全一致的创新研究。他还认为,文学生活研究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与社会之间的被动关系,它是主动走向社会,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所推进。王尧认为,“文学生活”概念蕴含着人文主义立场,让研究者有可能重新思考现有的文学秩序以及当前的文学和文化环境。而且,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强化与历史、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是非常必要的工作,而文学生活研究很好地重建了这一关联,因此,它体现了文学研究的方法学革命。此外,他还认为文学生活研究将有助于克服当前文学史书写的某些缺陷,比如只看到文



本、作家和简要的文学思潮,却看不到文本背后的生产过程。张颐武认为,随着传媒方式的迅速更替,中国的文学经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所以文学研究不能固守不变,特别是在理论方面,需要提供具有想象力的阐释,改换对象,改换方法,改换想象,重新召唤文学批评的想象力,给今天的现实一个新的描述,一个新的理论上的解释。文学生活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宋剑华认为,对比传统文学研究的方法,文学生活研究在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研究模式,特别是将文本内部因素与外部调查进行深层结合,将文学故事的传播与大众接受及社会影响力相关联,重视文学研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将有效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效果,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①

2017年6月2~4日在山东大学召开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与史料整理学术研讨会暨‘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标志着“文学生活”研究的重心由当前文学生活研究转向文学生活史研究。会上,温儒敏阐述了将“文学生活”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指出文学生活史的研究将会细化和丰富文学史的对象世界,催生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姜涛认为,文学生活史的研究与近年来不少学者关注的社会史视野具有内在呼应,也将有助于重建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刘方政对“文学生活史”的概念所指、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均作了深入阐发,提出“文学史坐标”与“阅读坐标”两个概念,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是完整的

^① 参见贺仲明:《“文学生活与学术新视野”会议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关注民生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能够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提供历史借鉴。傅谨着重讨论了文学生活史研究理应具备的人类学视野和问题意识,并结合自己在《荀慧生日记》研究中的经验印证了文学生活史论题的学术潜能。张学军借用“次文学”的概念重新审视了《红高粱》的经典化问题,认为“次文学”作为一种基于原著改编的再创造的艺术品,对《红高粱》的经典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春勇指出,在当下这样一个智能时代,的确需要更新我们看待文学的思维方式。黄发有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研究路径和样板,即在梳理与反思“十七年”文学稿酬政策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考察了稿酬制度对“十七年”文学生产的多方面影响。丛新强从文学史建构的整体视野出发,深入阐释了文学生活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指出“文学生活史”命题至少包含以普通读者为中心的主体性选择、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价值性判断和以社会反应为参照的动态性描述三个层面。史建国从新的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象世界的多重可能性两个方面展开理论辨析,特别关注了新旧变革中民众文学生活内容的变化,翻译文学、通俗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空间的差异等问题。孙基林、马兵、国家玮、叶诚生各自提供了文学生活史研究的具体个案,将这一新的文学史叙事分别坐实于当下的诗歌生态,留学时期的胡适,20世纪30年代的济南、青岛双城文化生活以及全面抗



战前夕的大型征文活动。^①

从当前“文学生活”研究到“文学生活史”研究,“文学生活史”被进一步引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学者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但是对“文学生活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有着基本的共识。“文学生活史”研究强调文学研究应该主动关注读者(特别是大众读者)的文学接受情况;它将文学生产、传播、阅读与消费的过程与社会精神文化相联系,强调研究文学与社会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文学生活史”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在此研究理念指导下的具体研究实践也在进一步的推进之中。但是,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接受状况与新时期以来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它的潜在背景和理论支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型,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由思想阐释走向知识重构的重要转向。程光炜、李杨、吴秀明、陈晓明、张清华、贺桂梅、王本朝、孟繁华、罗岗、阎浩岗、杨庆祥、王岳川、陶东风、张荣翼、南帆等人近年来的研究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2009年10月24~25日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是具有“历史化”学术趣味和取向的学者的一次集体亮相。陈晓明的理论/作品倾向和程光炜的实践/批评倾向,分别代表了

^① 参见叶诚生:《“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与史料整理学术研讨会暨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会议综述》,《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两种不同路径。福柯、布尔迪厄、阿尔都塞、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人的思想都是中国当代学者“历史化”研究的重要借鉴。

陈晓明借用詹姆逊的“历史化”理论结构,以文学作品文本为研究对象,将“历史化”“还原到文学文本可理解的具体美学层面”^①。在陈晓明这里,“历史化”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将当代文学史看作一个不断强化的“历史化”过程,再现这样的“历史化”谱系,而后对其进行阐释、反思和解构;其二,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文本所携带的“历史化”意图和表现,研究文本与历史、文本与现实的互动关系。陈晓明认为:

文学的“历史化”表明文学与社会现实构成着一种特殊的想象关系,通过“历史化”,文学使社会现实具有了可被感知和理解的形式和意义,并且使自身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历史化”不仅关注文学如何建立自身的历史,更关注文学如何使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合理的“历史性”,如何以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和解释人类生活。^②

程光炜的“历史化”也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回到历史语境”,强调“史料”对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历史现场感”;二是将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程光炜说:“‘历史化’观点的提出,针对的是始终把‘当代文学’当作‘当下文学’这种比较简单化的历史理解。”^③在程光炜这里,“历史化”更多是作为

①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②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0页。

③ 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一种研究当代文学的方法,致力于将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程光炜将自己的研究方式称为“‘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他说:“这就是把过去当代文学研究比较强调‘作家作品’的研究方式,稍微往‘文学及周边研究’方面靠靠,通过把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陌生化’,再重新回到‘作家作品研究’当中去。”^①吴秀明的研究与程光炜接近,“主要是针对‘研究’(而不是‘创作’),某种意义上,是‘对研究的一种研究’”。吴秀明称当前的“历史化”研究区别于此前的“重写文学史”等思潮,“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此前‘历史化’的‘再历史化’”。^②

“历史化”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不再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仅仅理解为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背景,而将它们视为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生成的基本框架和土壤。“历史化”的基本理论认为文学生成于历史之中,同时,由于文学的叙述性本质,其本身有着强烈的“历史化”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又创造历史。许多“历史化”研究学者都主张对既有的研究结论、观点以及研究范式重新陌生化,即借鉴詹姆逊“永远历史化”的观点,回到文本与文本创作者的历史语境,回到既成结论和观点产生的历史语境,既关注“文本的历史性”,也关注“历史的文本性”。

程光炜倡导的“重返 80 年代”研究所产生的许多重要学术成果,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表意的焦虑》《现代

① 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 年第 3 期。

② 吴秀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文艺理论研究》2016 年第 4 期。

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吴秀明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以及孟繁华、程光炜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著作，都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具体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进行“历史化”研究，既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

本书以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接受史为中心，考察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既成观点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这些观点的形成、演变与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属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不仅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大背景，而且在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方面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特别是许多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成果与结论直接被本书引用和采纳。

第一章

“历史化”视角下的《平凡的世界》接受史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之后即进入了“历史化”通道。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研究者们对《平凡的世界》的解读,都是它“历史化”进程的一部分。虽然时常有研究者为《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文学史著作的“公允”评价而感到“不平”,但是,《平凡的世界》在文学研究领域从来都没有遭到“冷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06年雷达主编的《路遥研究资料》出版,2007年李建军主编的《路遥评论集》《路遥十五年祭》出版,2015年厚夫的《路遥传》出版,2016年延安大学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与路遥研究中心编的《路遥,路遥:〈路遥传〉评论·访谈集》出版,都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对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的重视。

《平凡的世界》的“历史化”过程是不断对其进行“定位”的过程,其中显现出来的是一个个文本形象,形象背后是建构与解构的逻辑与知识。归纳起来,文学接受史上《平凡的

世界》的“形象”有：现实主义文学力作、现实主义“畅销书”、“文学事实”意义上的经典、人生之书、励志之作、文学史著作上的缺席者、“改革文学”的代表等。

本章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将《平凡的世界》文本形象“历史化”，考察形象建构与解构的逻辑与知识；第二，揭示路遥的“历史化”诉求与《平凡的世界》的“历史化”图景，并总结评论界对《平凡的世界》所展现的“历史化”图景的认识。本章的研究意义在于利用“历史化”概念内部的张力，为《平凡的世界》的“历史化”研究提供一个综合视角，为《平凡的世界》全面“历史化”奠定基础。

第一节 “历史化”学术思潮与 《平凡的世界》接受概况

一、“历史化”：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的 “学术思潮”

“历史化”是本章研究《平凡的世界》的角度，也是研究《平凡的世界》的目的。吴秀明认为，“历史化”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个新的话题，一个惹人关注的新的学术生长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历史化’”。